

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日] 松浦章 / 著
李小林 / 译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

上

[日] 松浦章 / 著
李小林 /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RITTEN BY
MATSUURA AKIRA

JAPAN
FRIEND BOOKSTORE
2002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与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

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一书是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松浦章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力,孜孜不倦潜心研究之结晶。作者自本科三年级起,便对清代携汉籍到长崎的中国商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9年1月,本科毕业论文《山西商人范毓麟事迹》的问世,标志着作者正式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该文也成为构筑本书的基础。此后,作者深感学术界以往对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只侧重于欧美诸国的对华贸易,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史。而日本学术界的日中贸易研究,尤其是锁国时代的长崎贸易史,从中国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十分罕见,有悖于朝廷政策的民间海外贸易史的研究更未受到重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因此,作者以中国东南港口城市为中心,对清代中国商人的海外贸易状况展开了系统、详细的考察和研究,用九编三十四章的篇幅撰写完成这样一部巨著,2002年由日本朋友书店出版发行。

通过翻译,我感到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谋篇布局,层次分明

全书由“总论”“第一部”和“第二部”三大部分组成。作者在以题为“清代海外贸易经营形态”的“总论”里,用三章的篇幅,指出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问题和范围,综合考察中国商人向海外拓展

时的诸多问题,如海外贸易的对象与地域、海外贸易的资本筹措方式以及海外贸易工具即海船航海时的运营模式等问题。

第一部:以“清代对日贸易经营形态”为题,用五编十八章的篇幅,具体探讨来航长崎中国商船的经营形态、作为商船资本家货主与来航长崎商人代表商船船主的关系、中国商船的航运状况,以及中日之间主要贸易商品等问题。

第二部:以“清代海外贸易诸形态”为题,则用四编十三章的篇幅,不仅具体探讨往返于东南亚地区中国商人的情况、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期中国贸易和瑞典东印度公司贸易活动状况,而且对清代海关和出入海关时商船所需办理的手续及清代中国人搭乘海船移民海外等情况也作了详细论述。

从上述介绍的本书篇章布局及研究途径和内容来看,作者思路清晰:先综合后具体,从面到点,层层展开,有很强的层次感,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二是内容丰富,新意迭出

本书所承载的内容十分丰富。作者从清代海外贸易政策、贸易资本、贸易对象、贸易地域、贸易商人、贸易船舶、贸易商品、贸易方式、贸易组织、贸易管理和贸易移民等层面进行了系统、详细的论述,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关于贸易资本的筹措,作者在总论第二章就宋代至清代海船经营资本如何筹措作了叙述,指出海船经营资本筹措:有通过共同出资的方式,即以“合股”“合伙”的办法来进行,较好地解决了个体筹资和海上遇险的难度和压力;沿海地区富民阶层从事与砂糖业相关的大商人也经营着海船;还有日本富人投资于中国船主和清代政商大规模参与海船的经营;此外,从搭乘船的客商销售额中按比例抽成,或从出洋谋生的乘船者那里收取运费,将所得资金再购买返乡货物来创造新的利润,也是增加船舶经营资本的另一方式。作者在第三章进一步指出

商人共同出资“合股”形态则多称为“公司”，认为“公司”一词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清初，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商人黄成供等出资，从台湾出发到日本、暹罗贸易的商船就注明是“公司货物”；安永三年（1774）到长崎贸易的午六号船船员名簿中有“管公司余庆，二十二岁”；宽政元年（1789）漂抵土佐安利船上的桶写着“安利公司”字样；文化四年（1807）、文化五年（1808）到长崎贸易的商船也有带着“乍南公司”标记的桶等。又如本书提出清代沿海地区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人数居首位的是福建，作者从出港船只的数量来分析福建省的情况，认为18世纪中期，从福建省出港的海外贸易船只，一年多达60至70余艘。而广东省经粤海关每年出入港的海外贸易船只，仅为20至30余艘，只占福建的1/3至1/2左右。这一观点，无疑纠正了以往学术界以广东位居榜首的看法，等等。类似这样富有新意的观点，不胜枚举，恕不赘述。

三是资料翔实，说服力强

本书广泛利用明清档案、朱批奏折、实录、起居注、会典、方志、文集、笔记、日记、族谱、碑文等中国资料和《同文汇考》《备边司誊录》《东方见闻录》《巴达维亚城日志》《耶稣会士书简集》《菲律宾诸岛志》《东印度公司档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等外国资料，丰富而翔实，特别是东京内阁文库所藏江户时期有关幕府的文书、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有关长崎奉行所的文书，以及《华夷变态》《草庐杂谈》《唐通事会所日录》《唐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割符留账——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得泰船笔语》《通航一览》《唐蛮货物账》《唐人番日记》《文化丁卯唐船漂抵记》《宁波船漂抵始末日记》《长崎实录大成》《长崎实录大成正编》等已刊、未刊资料，都被大量使用。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新发现并利用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如《丰利船日记备查》）和稀有资料（如现存于长崎崇福寺和兴福寺中国商人献纳的匾额）。作者利用中日双

方记载的同时,还详加对比、考论。此外,作者曾多次奔赴东南沿海港口、商品集散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从而使本书的立论更具说服力。

四是图表并茂,真实科学

作者在本书叙述相关内容时,选择了珍贵的图片插入其中,如第一部第四编第二章“清代乌船和‘长崎版画’”中插入了13幅有关乌船的“长崎版画”;第二部第三编第二章“清代海关与中国海船”中插入了“平湖县印照”“联单”和“浙海关商照”等图片。这些图片的插入,使本书更具历史的真实感。

作者还善于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将贸易商船、商人、商品、移民等与数量有关的内容,都编制了表格,这无疑又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

总之,本书不愧为迄今为止部头大、论述全面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的佳作。

本人与松浦教授相识于1996年8月。那时,松浦教授前来南开大学,出席“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成立40周年暨第3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本人承担了松浦教授《明清时代的海盗》一文的翻译(该文刊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此后,本人又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一篇论文,题为《天启年间毛文龙占据海岛及其经济基础》,后来成为其《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一书中第二编第二章的内容(凤凰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

本书的翻译由本人和南开大学高教研究所赵永东副教授承担。其中赵永东副教授负责翻译了总论;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的第三章;第四编的第二、第三、第四章。本人负责翻译了序言;第一部第三编的第一、第二章;第四编的第一章;第五编;第二部和跋

语。最后全书的通稿和校译工作皆由本人完成。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原作者松浦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不厌其烦地通过邮件帮助我们解决翻译中所遇到的难题。曾在南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博士生赵树国、王超,攻读硕士学位的韩扬、孙熙隆、王丽婕、贺燕燕、薛未未等同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中文资料的录入、英文注释的翻译、参考书目的编辑等,挚友周晓虹女士也给了本人很多的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后,真诚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领导和马晓雪编辑为本书的出版辛勤付出。

李小林

2013年12月

序 言

清代史研究从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才正式开始。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学术界主要是围绕清朝建立以来的政治制度史、社会经济史，特别是以土地经济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的，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明代后期以来有悖于朝廷政策的民间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却未受到重视，甚至可以说是一片空白。不过，从以广东省广州为主的港口城市与欧洲各国以及和美国的贸易，尤其是关于中英之间的贸易史，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等视角出发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已进行海外贸易的中国港口城市，并不限于广州，还包括福建省的厦门和福州，浙江省的宁波和乍浦，江苏省的上海等。从这些港口出发的贸易船只，把中国的产品运往海外，返航时又将海外的产品带回中国。但是有关这些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的研究，与以广州为中心的贸易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本书集中研究清代上述港口城市的海外贸易问题，着重探讨以乍浦为中心的对日贸易、以厦门为中心的对南海贸易情况，以及管理船舶出入境的海关与贸易船只的关系、中国人海外移民

等问题。

关于清代日中贸易，在我国把清代对日贸易作为长崎贸易史的一个环节，研究颇有进展，但从中国商人的角度研究几无所见。故本书试图探明中国商人是怎样经营船只、运载何种货物，以及这些船只在“锁国令”时期前往长崎进行贸易活动的出发点等，从而揭示日中长崎贸易的实际状况。

关于中国对南海的贸易问题，本书试图通过以厦门为中心的福建商人在东南亚各地的活动情况，探明中国和菲律宾、苏禄之间的交通贸易关系。关于中国对欧洲贸易的问题，本书试图阐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在广州而且在浙江省的舟山进行贸易的实况，以及瑞典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输入中国茶叶等问题。另外，本书还探讨了与海外贸易相联系，办理贸易船只进出港口手续的海关诸问题，以及利用帆船这一海上交通工具远渡海外的华南移民等问题。

本书依据的主要资料：日本方面是以东京的国立公文书馆内閣文库所藏与江户幕府有关的资料，以及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与长崎奉行所有关的资料；中国方面的资料，则与中国开放资料状况密切相关。笔者开始研究即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清史一级资料是“大清历朝实录”和《明清史料》甲编至壬编（壬编是 1967 年 4 月刊行，癸编是 1975 年 8 月刊行）。70 年代后期，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宫中档案被陆续影印出版。80 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开始大量翻刻、影印出版原内閣大库所藏的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公开面世，对笔者研究的深入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到了 90 年代，到中国旅游、住宿、查阅资料等方面都变得十分便利，所以只要出访北京，就很容易阅读到尚未刊行的档案资料。如笔者在 1993 年 3 月以关西大学在外研究调查研究员的身份在北京滞留 6 个月，其间，查阅了不少档案资料。又于 1995 年初次访问台北时，在台北故宫博物馆

也阅读到了该馆所藏的档案资料。正是通过这样的途径,补充完成了本书其中一部分内容,从中读者也可发现本书各章所引用的中国资料深受着时代变化的影响。

松浦章
2001年12月

目 录

上 册

序言 / 1

总论 清代海外贸易经营形态 / 1

第一章 清代海外贸易对象与地域 / 3

第二章 中国海船资本筹措 / 23

第三章 清代海船与“公司”组织 / 39

第一部 清代对日贸易经营形态 / 49

第一编 清代对日贸易经营构建 / 51

第一章 清代对日贸易船舶经营模式 / 51

第二章 乍浦船行——通商日本的批发商 / 92

第三章 清代对日贸易中船员的私货贸易 / 111

第二编 清代对日贸易之财东——中国货主 / 135

第一章 清代对日贸易中的官商与民商 / 135

第二章 山西商人范毓麟一族家谱和事迹 / 161

第三章 山西商人范清济资产状况 / 178

第四章 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 / 184

第三编 清代对日贸易船主阶层 / 199

第一章 宁波商人姚鹏飞与长崎贸易 / 199

第二章 长崎贸易江浙商人与福建商人 / 213

第三章 嘉庆、道光时期中国商人与长崎贸易 / 225

第四编 清代鸟船运营形态——来航长崎的商船 / 251

第一章 清代鸟船与长崎贸易 / 251

第二章 清代鸟船和“长崎版画” / 297

第三章 清代鸟船丰利船的航海日志 / 315

第四章 清代官商采办洋铜返航船只 / 341

下 册

第五编 清代对日贸易之货物 / 359

第一章 清代对日贸易之船载货物 / 359

第二章 日本海产品输入中国 / 377

第三章 中国、东南亚丝织品出口日本 / 396

第四章 清代大黄出口海外与日本 / 411

第二部 清代海外贸易诸形态 / 427

第一编 清代南海贸易诸形态 / 429

第一章 17 世纪初欧洲人所见中国船只之南海贸易 / 429

第二章 清代福建商人与海外贸易 / 440

第三章 中国与苏禄间通商关系 / 454

第四章 中国与吕宋间的海上贸易 / 479

第二编 清代对欧洲贸易诸形态 / 502

第一章 英国东印度公司初期的中国贸易 / 502

第二章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中国贸易 / 519

第三章 瑞典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茶 / 527
第三编 清代海外贸易与海关 / 538
第一章 清代前期海关监督 / 538
第二章 清代海关与中国海船 / 559
第三章 清代前期浙江海关与海上贸易 / 573
第四编 清代海洋圈与移民 / 590
第一章 清代海洋圈与海外移民 / 590
第二章 清代海外贸易与移民 / 612
第三章 清末民初福建海外移民 / 621
附：公元、清朝纪年、日本纪年对照表 / 642
参考书目 / 650
跋 语 / 687